# 促成三军大会师的张浩

张浩，1897年2月出生，湖北黄冈人，原名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八路军一二九师首任政委、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冒险回国带回共产国际最新精神，还是关键时刻说服张国焘北上促成红军胜利会师，张浩都毫无怨言坚决完成，一生忠心为党为国，堪称楷模。1942年3月，张浩因积劳成疾，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自扶棺，并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对张浩的一生予以高度赞扬。

身先士卒，工人运动的“闯将”。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张浩受组织委派到长沙望麓园织布厂担任技师兼党支部书记，从事工人运动。张浩看到工人们士气低落，他就给工人们讲述大罢工中施洋、林祥谦两位烈士无所畏惧、宁死不屈的英勇事迹，教育和鼓励广大工人，增强在困难面前的战斗勇气和信心。5月，由于长沙人力车老板不顾工人反对，擅自加租，上千名人力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张浩作为总指挥，身先士卒，带领工人上街请愿游行。此时，长沙又发生了日本兵枪杀长沙市民的惨案，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工人大罢工引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洪流，最终长沙人力车工人大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5年受党组织派遣，张浩化名林春山，到上海组织工人运动。12月初，由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发起，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召开了万人“反奉倒段”游行集会，那天天气异常寒冷，但群情激愤，“打倒段祺瑞”“推翻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局出动了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会场，企图冲散集会群众。就在这紧要关头，张浩带领数百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身穿工人服装、呼喊响亮的口号从杨树浦方向赶来，他毫不畏惧，挥动手臂迎着刺刀与军警搏斗，头部、腕部、胸部都被敌人刺刀戳伤，血流如注，衣服顿时染成了红色，张浩忍着剧痛仍大声高呼：“弟兄们，我们要反对屠杀中国人，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冲啊！弟兄们！”在他奋不顾身的精神鼓舞下，工人群众抬起浑身是血的张浩，奋力冲出军警包围，按预定计划游行示威，英勇悲壮，震动淞沪。张浩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钦佩和信任，经此一役，工人运动闯将“林春山”（张浩的化名）的鼎鼎大名便流传开了。

冒死为党带回“共产国际的声音”。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浩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恢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而且要求路上不能携带一字一纸。由于当时回国之路沿途关卡重重，回国同志的人选也就变得极为谨慎，代表团成员一致认为：这位同志不仅要意志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一定的经验和威望，并且必须是国内同志们信任之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党组织最后把这一重任赋予张浩。张浩态度坚决地接受了这项光荣而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便将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八一宣言》以及密码本等内容反复背诵，强记在脑海。

9月，张浩假扮成商人从莫斯科出发，先至外蒙古，然后从外蒙古步行回国，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九死一生穿越了茫茫的沙漠和戈壁。当他到达宁夏进城时，意外发生了，由于浓重的湖北口音，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守城连长的怀疑，被无端地扣留。为了完成党交代的重要任务，早日联系上党中央，张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坚毅和机智，他主动讨好守城官兵，帮助他们干活，渐渐地和连长也熟了，扣留一个多月后，守城连长从他身上也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终将他放行了。

张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紧紧地握着他粗糙的手说：“我们的工人朋友啊，转眼就10年没见了，听说你为革命吃了不少苦，是你给我们送来了共产国际的指路明灯，还有一双顺风耳呀。”随后，在瓦窑堡召开的六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党中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方针，张浩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声音”为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键时刻促成红军胜利会师。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极具政治野心，在得到红军总政委职务后仍不满足，还想争夺党内更高的职务。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又是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决定，由张浩做说服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主要考虑：张浩对党绝对忠诚，党性原则强，顾全大局，党内资格老且有较高的威信，又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而且当时张国焘成立所谓“中央”，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也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和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当时张浩有其为难之处，因为在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张国焘未另立“中央”，所以共产国际也没有赋予他解决张国焘问题的任务。张浩毅然决定接受党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基于对军事斗争策略的灵活运用，张浩给张国焘发电报，他是奉共产国际委派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新的意见。张国焘在复电中继续攻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但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还试图拉拢张浩。张浩不为所动，继续致电张国焘，并严正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对中央的原则上的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随后张国焘的思想发生了松动，因为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所谓的“第二中央”也就站不住脚，在党中央和张浩做了大量工作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张国焘最终被迫取消自己的“伪中央”，并同意北上。张浩为红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党立了大功。

# 砷毒之患：日本土吕久矿山砷污染事件

砷是一种有毒元素，它最为人熟知的化合物是号称“万毒之王”的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虽然人们对砷的危害认知已久，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土吕久矿山砷污染事件之后，砷污染问题才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土吕久矿山砷污染事件是一起由砷引发的环境污染，并导致居民罹患慢性砷中毒症的公害事件。由于该事件危害大、社会影响深，1973年2月，日本政府把慢性砷中毒症列为继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喘息病之后的第四公害病。

**回顾**

土吕久矿山位于日本宫崎县西臼杵郡高千穗町地区，是日本最早被用来开采炼制砒霜的矿山之一。20世纪初，矿山附近动物难以存活，植物成片枯死，居民罹患各种疾病。然而这些现象并未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村之耻”而被隐瞒了。直到1971年，小学教师斋藤正健在深入调查后向日本新闻社公开举报，称“土吕久矿山存在砷污染问题，周边居民人均寿命只有39岁，其中34%的人罹患呼吸道疾病”。1972年3月，宫崎县调查委员会在距离矿山400米的居民家中检测出高达8000mg/L的砷化物。同年7月，九州大学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砷化物会引起人体慢性中毒，从而引发神经炎、皮肤病和肺癌等多种疾病。此后，以土吕久矿山为事件中心，日本多座矿山相继被爆出存在砷污染问题，影响人数过万。

**影响**

土吕久矿山砷污染事件让日本政府意识到了砷污染防治的重要性。由此，日本开启了全国废弃矿山的污染整治行动，为解决砷污染问题作出了有益探索。

倒逼政府整治砷污染问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展了针对全国废弃矿山的环境污染调查行动，这对完善砷污染防治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70年12月，日本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其中强调了砷及其化合物是典型的土壤污染毒物。1991年，日本环境省首次规定了土壤中的砷含量不能超过0.05mg/L，1994年该指标被修改为0.01mg/L。此外，以《金属矿业等矿害对策特别处置法》为基础，日本政府还建立了包括矿害防治资金储备和对策补助等在内的多种制度，为治理矿山砷污染问题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制度体系。

促进民间力量参与砷污染治理。自1974年起，日本国内成立了多个声援土吕久地区居民的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土吕久公害被害者协会、土吕久矿害问题反思协会、砷中毒研究协会等），发起了关于砷污染问题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伴随着土吕久公害被害者协会的创立，亚洲砷联盟，一个更具影响力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也随即出世。该组织从日本发展到了亚洲各国，通过研究者和工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出了一系列有效减少砷污染的防治措施，为保护亚洲地区的生态环境贡献了积极力量。

推动公害救助体系不断完善。土吕久矿山砷污染事件之后，由于缺乏为砷中毒患者提供救助的法律依据，1972年8月，宫崎县政府发布了《土吕久矿山地区健康被害者的紧急医疗救助纲要》，正式将砷中毒患者的治疗费用纳入公费医疗体系。1973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为矿山砷污染患者的被害赔偿提供了直接依据。1975年1月，宫崎县政府又施行了《高千穗町土吕久矿山公害健康被害者的医疗补助条例》，承诺将对土吕久地区居民提供长期的健康观察和心理辅导服务。这些努力推动日本逐步建立了以法律—纲要—条例为一体的公害救助体系，有力地保障了砷中毒患者的医疗安全和精神需求。

**启示**

我国是全球含砷矿资源最多的国家，提高污染综合防治水平，推动砷行业健康发展，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反思日本土吕久矿山砷污染事件，对我们有如下启示。

构建砷污染防治法律标准体系。为了减少砷化物的污染危害，1995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第一次修订时，就明确增加了“禁止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的法律条款。2018年，生态环境部颁布了《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系统规定了不同性质用地中砷污染物的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为了控制水环境中砷污染的风险，我国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明确规定了水污染物中砷的排放浓度必须低于0.5mg/L。2006年，国家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生活饮用水中砷的毒理指标从0.05mg/L修订为0.01mg/L，为我国居民健康用水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一系列法律修订和标准完善措施，为推动我国砷污染防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健全砷污染事件防范机制。研究表明，砷污染的来源多样，其中包括含砷农药的生产和利用以及含砷化工原料的使用等。自2011年起，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联合高校对砷产业技术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实验研究，通过系统改进含砷产品的生产工艺逐步提升了涉砷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2015年12月，《砷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正式颁布，成为国内规范砷污染防治和管理行为的首部行业标准。该标准强调，要对涉砷行业实现砷污染物的全过程监控，确保含砷的废渣、废气和废水满足国家排放标准；同时对砷超标的地区进行严格监管，对砷污染的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在含砷制剂的使用方面，早在2013年我国就撤销了福美砷、福美甲胂等15个含砷农药产品的生产许可。自2015年起，我国还要求在动物饲料和养殖行业中不再添加含砷制剂，同时限制玻璃器皿、木材防腐、纺织制革等行业中含砷原料的使用量，全面强化了砷污染的源头预防。

推进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冶炼是砷污染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我国92%以上的一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及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矿产资源。因此，合理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减少和控制资源开采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推动实现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一，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加强对矿山有毒有害废水污染物的监督治理和查处力度，推进废弃矿山整治和矿地综合开发利用，确保矿山环境能够得到有效恢复和治理。第二，强化源头预防。以技术创新为抓手，多措并举地鼓励和引导矿产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技术升级和废料处理工艺改进，进一步解决矿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重开发、轻保护”问题。第三，坚持“谁治理、谁受益”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利用PPP模式、第三方治理方式，逐步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矿山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新模式，为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筑牢实践基础。

# 万山群岛战役：我军第一次海战胜利

万山群岛战役，发生在1950年5月25日至8月7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联合广东军区江防部队，为扫清退守万山群岛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而发动的一次登陆战役。整个战役历时75天，先后展开数十次激战，共击沉国民党军舰4艘，击伤11艘，缴获各种舰船11艘，歼敌700余人，俘虏192人，全面夺控万山群岛。此役让国民党“依托万山群岛、封锁珠江口、策应内地、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碎，使珠江口的坚固屏障得以建立，令新中国南海的海防得到巩固，为我军陆海联合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役也是我人民海军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第一次取得海上作战胜利。

正视弱势、分析优势，及时鼓舞士气。战役发起之前，我军在大陆战场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然而经历了金门战役的惨败后，我军对登陆作战一直心有余悸。而且，此次参战的海上装备实力敌强我弱，我海军配属有炮艇5艘、登陆艇11艘、运输船8艘，其中大部分是在战场上俘获的破旧船只。勉强算得上军舰的只有两艘，一艘是原美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舰“桂山号”，排水量仅有258吨，舰载武器只有40毫米火炮两门；另一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其余都是型号不一的小型炮艇和登陆艇，甚至连基本的航海仪器和通讯工具都没有，而且艇员大多数来自陆军部队，不熟悉航海登陆作战的战术。相比之下，驻守万山群岛的国民党海军都接受过美式训练，拥有大小舰艇30余艘，其中“太”字号军舰，一般排水量在1000至2000吨，速度可达18节，装备76.2毫米火炮和20毫米机关炮20多门，实力远远超过我军。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增加了我军的心理压力，必须想办法为参战部队树立信心，鼓舞士气。为此，前线指挥员在定下战役决心的同时，充分分析双方形势，认为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是从海南岛溃退下来的，立足未稳，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我海军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力量薄弱，缺乏海战经验，但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登陆部队又是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之师。最后得出结论：应把握当前战机，迅速实施登陆作战，充分发挥近战和夜战的优势，有很大概率战胜装备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前线指挥部的决心迅速在参战部队传达，顿时注入了强大力量，有效解决了战前信心不足的问题。

因地制宜、调整部署，优化战前布局。本次战役持续时间较长，在最终决战之前，我军区分不同阶段展开了规模不等的作战行动，如突袭垃圾尾岛，解放大、小万山岛等，取得了显著战果，但也蒙受了一定损失。前线指挥员及时总结各个阶段的作战经验以及教训，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作战方案，确保战役最后的胜利。首先，在6月中上旬安排参战部队进行短期休整，吸取垃圾尾海战中舰艇相互失去通联的教训，组建由步兵、炮兵和舰艇指挥员参加的联合指挥机构，实施渡海登岛作战的统一指挥，达到统一协同动作的目的。其次，加强对国民党海军活动的侦察工作，掌握敌舰艇的活动规律。6月10日，第329团派出2个排的兵力，攻占隘洲岛、大小蜘蛛岛等岛屿，并在岛上设置了观察哨所，经过10多天反复侦察，基本上掌握了国民党舰艇的活动规律。最后，有针对性地调整部署，加强作战力量。主要是调整海军舰艇部队的军政干部，充实战斗骨干；加强已占领岛屿的陆军部队火力配置；改装其中4艘登陆艇，在上面架设山炮或57毫米战防炮；改装地方政府支援的趸船，架设100毫米加农炮，作为海上火力支援。至此，我军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为敌舰艇布下了“口袋阵”。

巧用战术、机智勇敢，充分发扬火力。万山群岛战役的整个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机智勇敢、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各级指挥员能够灵活运用战术，发挥自身优势，集中优势火力，有效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垃圾尾海战中，在岛屿侧面海域待机的“先锋”号炮艇与国民党海军25号炮艇相遇，在火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方炮艇全速逼近敌方，猛烈开火，直接将敌方艇长击毙。最先登上三门岛的我军炮兵分队则集中火力击伤敌方扫雷舰，同时我军海上的舰艇火炮和趸船上的100毫米加农炮向停泊在外伶仃岛港口的国民党海军舰艇集火射击，当即击沉敌炮艇1艘，击伤2艘。国民党海军驱逐舰“信阳”号、炮舰“营口”号等主力舰艇企图进行报复时，我军“福林”“国楚”、509号3艘舰艇，与三门岛上的炮兵分队密切注意敌舰艇动向，待其进入预设的伏击圈后，突然开炮，成功压制了敌舰艇火力。特别是“国楚”号舰与国民党先进的“永”字号扫雷舰遭遇时，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快速将敌舰击伤。海上激战持续5个小时，我军取得了巨大战果，而战损仅仅是“国楚”号舰中弹1发，3人负伤。海上战斗的完胜，使我军得以占领万山群岛的绝大部分区域，残余的国民党海军全部逃回台湾，仅剩下孤守担杆列岛的国民党1个营的兵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足为惧了。

万山群岛战役虽然是一次陆海联合登陆作战，但与常规登陆作战不同的是，它的主要战场在海上，海军作战力量基本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战场上成为主角。

# “马革裹尸”：东汉名将马援的忠勇精神

马革裹尸是一则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成语，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乃东汉开国大将，封号伏波将军。马援胸怀“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磅礴之志，一生征战沙场、戎马倥偬。智取陇蜀，堆米为山；西平诸羌，安定百姓；南伐交趾，吏士见其皆诚服；北遏乌桓，敌军闻风纷逃散；最后殁于平叛五溪蛮的前线，终以马革裹尸还葬，无愧当年诺言。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马援为天下统一、国泰民安而驰骋疆场的事功印刻于史册，其忠勇赤诚、谦逊有礼的高尚品行更流芳千古，后世无不以其大义为标榜、为其忠勇而赞叹、闻其生平而潸然。

**胸怀大义，一片赤诚保江山**

西汉末年，百姓怨声载道、民变四起。初露头角的马援心系天下、忧心黎民，在经过一番斟酌思索后，“择明主而佐”，毅然决然追随刘秀，以赤胆忠心、才智谋略支撑家国大义，为刘秀重新一统天下、开创“光武中兴”立下赫赫战功。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莽政权灭亡后，天下呈分裂割据状态，公孙述与刘秀各据一方、自立称帝，实力稍弱的隗嚣则盘踞陇右、自称西周大将军。此时，马援为隗嚣招募并深受器重。随着公孙述与刘秀先后称帝，处于弱势的隗嚣派马援探听虚实。马援亲眼所见公孙述“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而刘秀“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同时受到两帝垂青的马援，不受人情束缚，作出客观评价：公孙述乃“井底蛙耳，妄自尊大”，刘秀则“才明勇略，非人敌也”。时间识人，岁月识心。经过长期观察，马援决定辅佐刘秀，并诚心劝说隗嚣归顺明主。纵然后来隗嚣阳奉阴违、发兵拒汉，马援亦忠心耿耿、不改其志。

建武八年（公元32年），隗嚣听信奸佞挑拨起兵谋反，刘秀亲率大军讨伐。当部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刘秀紧急召见马援，向其征询进兵意见。马援行军数载，惯擅兵法谋略、运筹帷幄，他跟刘秀详细分析当下形势，断言隗嚣的部队早有分崩离析之兆。又以米盘排兵布阵，以米粒堆成山川河海、高山沟壑、城镇都市，透彻分析战局，刘秀大赞：“虏在吾目中矣。”“堆米成山”成为后世军用沙盘的鼻祖，既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发明，也是马援以智慧与赤诚辅保江山的生动见证。

**谦逊有礼，躬体力行正家风**

“正家而天下定矣。”古时那些子孙多贤达、功业多卓著的名门，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身居朝堂沙场，马援处处展现大义凛然、赤胆忠心；面对家人亲友，马援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强调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不可轻薄无礼、失却分寸。

马援南伐交趾期间，听闻马严、马敦两侄儿喜与轻浮的侠客结交，并好讥笑他人之事、妄论他人长短。马援深感不安，亲自为侄儿寄去一纸家书，言辞恳切地劝诫他们慎交友、戒妄议，希望后辈多多结交像龙伯高一样敦厚谦逊、谨言慎行之人，不要行事作风流于轻浮、自大狂妄。他语重心长地说：“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字里行间，是为子孙长远计的远见，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教导。

《后汉书》记载，马援之女明德皇后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对待君王不矜不伐、娓娓进谏，对待长辈孝顺恭敬、婉静有礼，被誉为“德冠后宫”之贤后。明德皇后之德性养成，离不开马援的谆谆教导与清正的家风熏陶。

**忠勇无双，马革裹尸终还葬**

马援功勋显赫却不贪图名利，终其一生为国效力、尽忠职守，始终担忧自己德不配位、无功受禄。他在朝廷上不结党营私，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以此报答国家的信任。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官拜陇西太守，边塞战事频发，他带领部队勇猛奋战，即使被飞箭射穿小腿，仍坚持指挥将士横扫敌军。三年后，马援从西南方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亲友们都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其中有个名叫孟冀的，以足智多谋闻名，是马援的老朋友。他对马援说道：将军啊，大丈夫沙场立功，此番得胜还朝，皇帝定有封赏，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不料，未等孟冀说完，马援就皱着眉头对他说：我本指望先生能说些指教我的话，为什么先生也随波逐流，一味地夸奖我呢。见孟冀不语，马援说：男儿不应该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然后被子孙用棺材敛尸埋葬。大丈夫战死沙场，用马的皮革裹着尸体回来埋葬，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方武陵溪五溪蛮暴动，马援虽年过花甲，仍请战自荐：“臣尚能披甲上马。”刘秀见其豪气未减、壮心未已，由衷感叹：“矍铄哉是翁也！”平叛途中，马援已身染重病，仍忧心国事。每当听到敌人逼近、击鼓叫喊时，仍会拖着病体察看敌情。虽因决策失误而陷入险境，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不放弃希望，践行了“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誓言。麾下将士无一不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勇毅所动容。

马援荣耀一生，身后却遭奸佞陷害。原本为抵御暑热瘴气而从南方运回的薏苡种子，被别有用心者污蔑为“明珠文犀”。马援终以莫须有的“明珠之谤”，名灭爵绝、凄凉下葬。正当亲朋故旧纷纷避之不及、生怕引火上身时，唯前云阳县令朱勃挺身而出上书鸣冤，诉说马援一生功绩及身后凄凉。“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辞意哀切令刘秀动容，然空余怅惘。

马援为国效力数十年，西征塞外，北抵沙漠，南渡江海，在瘟疫瘴气中战死沙场，却落得一个褫夺封号、蒙冤待雪的悲凉下场。荣耀与悲哀相互交织，使其人生充满悲剧性色彩。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千秋功罪后世评说。马援以“常恐不得死国事”的一腔孤勇、“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青云之志，支撑起为家国安定冲锋陷阵、为苍生黎民出生入死的忠勇之躯。这份操守与坚贞，感动的不仅仅是朱勃，更是后世无数人。